

新發現戴震佚文與江、戴師生關係重探

林勝彩*

〔摘要〕

清代學者戴震（1724-1777）身後發生「晚年背師」公案，對其學術人格造成頗大之斲傷。然因缺乏戴震、江永（1681-1762）所撰有關二人關係之文字，自清末以來，此一公案仍迭有爭議。對於戴震與江永二人的關係，學者間主要有三種看法：一者確認戴震與江永存在師生關係，批評戴震晚年不敬其師；其次，認為戴震對江永始終敬禮，無背師之行為；其三，認為戴震與江永誼在師友間，未嘗著籍為弟子，故不應受背師之誚。2004年8月底，大陸學者漆永祥於上海圖書館發現戴震佚文一篇，撰於乾隆十五年江永七十大壽時，為解決此一公案透露曙光。漆氏認為戴震在〈壽序〉中對江永學行有極高之評價，故學者認為戴震不尊江永之說當不攻而自破。由於此篇佚文為近年出版之《戴震全集》與《戴震全書》所未收，亦為歷來論述戴震與江永關係之學者所未見，對進一步探討戴震是否背師的問題有極高之參考價值。然此佚文為戴震「早年」所撰，其時戴震雖尚尊禮江永，然無解於學者對戴震「晚年」對江永態度轉變之批評，故漆氏之說值得商榷。本文根據此篇佚文，對戴震與江永之關係重加討論，祈使此一公案之爭議得一解決。

關鍵詞：戴震、江永、佚文、壽序、師生關係

*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清代學者戴震（字東原，1724-1777）¹在傳統考據與義理二大領域皆有極高之成就，在乾隆年間為少有之例，其人於清代學術史上之重要地位，亦為學界所盛推。然而東原身後發生《水經注》勦襲與晚年背師二大公案，對其學術人格造成頗大之斲傷，在歷代大儒中亦不多見。東原校定《水經注》是否襲用趙一清（1709-1764）著作一事頗為複雜，亦較為學者所重視，然而至今仍聚訟紛紜，爭論不休。²至於東原與江永（1681-1762）之關係，學者間主要有三種看法：一者確認東原與江永存在師弟關係，批評東原晚年不敬其師；其次，認為東原對江永始終敬禮，並無背師之行為；其三，認為東原與江永誼在師友間，未嘗正式著籍為弟子，故不應受背師之誚。

然因缺乏東原、江永所撰有關二人關係之文字，自清末以來，此一公案仍迭有爭議。近覽《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第1期，發現其中刊載東原佚文一篇，為解決此一公案透露曙光。據大陸學者漆永祥先生的按語說明，此佚文為其於2004年8月底，在上海圖書館訪書所得。該館藏吳縣潘氏寶山樓核鈔本江永《善餘堂文集》一冊，不分卷。其中除收錄江氏著作二十餘篇外，書末更附有東原文字一篇，為乾隆十五年（1750）江氏七十大壽時所撰。漆氏認為東原在〈壽序〉中對江永學行有極高之評價，故民國間學者以為東原不尊江永之說，觀此佚文當不攻自破。³

由於此篇佚文為近年大陸出版之《戴震全集》與《戴震全書》所未收，亦為歷來考論戴震與江永關係之學者所未見，對進一步探討東原是否背師之問題有極

1 戴震生於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己巳，為西元1724年1月19日。以下標示其年歲，仍守舊法，以扣除1722計算。

2 參看陳橋驛：〈《水經注》趙、戴相襲案概述〉，《水經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66；〈論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經注》的功過〉，《鄴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60-80；楊應芹：〈戴震與「水經注」——從新發現史料談起〉，《大陸雜誌》第九十一卷第二期（1995年），頁30-43。

3 漆永祥：〈新發現戴震佚文一篇——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第1期，頁122-123。

高之參考價值。故漆氏發現此篇佚文之功勞可謂甚大。然細讀此篇佚文，筆者卻得出與漆氏不同之看法。以下謹將個人之意見寫出，以就教於關心此一學術公案之學者。

二

東原與江永是否存在師弟關係，學者間一直存有爭議。然而據新發現之東原佚文，此一爭議實可劃下一句點。由於此文事關重大，故將全文先行轉錄於下，篇名從漆氏定為〈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

經學之難，或一代數人，或數千年一人。若漢之鄭康成（玄，127-200），宋之朱子（熹，1130-1200），其學皆殊純之學，其人皆亘古今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人。然而竊猶有憾者：鄭氏之學，無所不通，一洗專門固陋之習，唐賈、孔諸儒為疏義，猶或未能盡；中朱子上接鄒魯，下繼濂洛，理精義明，群言有所折中。而踵其學者，或鮮博物考古之功，非學力之有所限，蓋能兼之難也。

吾師江慎齋先生，生朱子之鄉，上溯漢、唐、宋以來之絕學，以六經明晦為己任。震少知向慕；既數年，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所讀諸經，往來問難，承口講指畫，然後確然見經學之本末。既而先生就館本邑，未能從學，深憾恨焉。

震之愚，固不能窺先生之萬一，又未獲盡讀先生之書，所得讀者，有《禮書綱目》、《周禮舉要》、《禮記擇言》、《律呂新義》、《深衣考誤》、《近思錄集注》、《古韻標準》、《切韻表》、《推步法解》、《翼梅》等數種，博大精微，不可涯涘。《禮書綱目》，前大中丞趙公暨禮館所抄者，特其梗概，先生尚欲博采眾說而論定之，卒朱子晚年之志。《律呂新義》一書，積數十年精思，始悟有自然理數，寓于河洛之中，獨取《管子》、《呂覽》之言，與聖祖之旨吻合。史遷之下，凡言黃鍾最長者，皆不明中聲之理，有體有用，發千古所未發，猶恨不能起朱子及蔡西山（元定，1135-1198）而質之。

先生之在都中也，三禮館諸公服其精核，咸就商榷，先生隨問隨答。

震親見其筆札數百條，發微訂誤，宜吾邑程中允、荊溪吳編修，經術最邃深者，皆以真吾師目之。先是，有《四書典林》，聊救制義家杜撰不根之弊，趙撫軍序而刻之，幾于家有其書矣。而其有關經學之大者，稿存篋笥，未能盡問世，當必有知音者，廣為傳之。

震少覽近儒之書，所心折者數人：劉原甫（敞，1019-1068）、王伯厚（應麟，1223-1296）之于考核，胡朏明（渭，1633-1714）、顧景范（祖禹，1631-1692）、閻百詩（若璩，1636-1704）之于水經地志，⁴顧寧人（炎武，1613-1682）之于古音，梅定九（文鼎，1633-1721）之于步算，各專一家。先生之學力思力實兼之，皆能一一指其得失，苴其闕漏，著述若此，古今良難。

今聖主崇經學，特下明詔，博采通經之士，邑侯陳公以先生為首荐，先生堅辭，不獲已，但以所著書目報去，且致書與震，言馳騫名場非素心。又自謂生平撰著，得之午夜被中、白晝几上為多，兀兀窮年，不知老至，能知者鮮，亦不求人知。蓋先生所造至深而自信者審矣。

今年七月十七日，先生七十大慶，蓋非尋常稱頌之辭，可以擬諸形容。是以一切膚語，概從芟略，直舉及門以後所知，與先生所自言者書之。自茲以往，年益高，學益進，自有不朽大業，藏名山，留宇宙，作朋三壽，何足為先生侈陳哉！乾隆十五年，歲在上章敦牂，月律中夷則，門人戴震頓首再拜撰。

據篇末所云，可清楚得知〈壽序〉一文撰於乾隆十五年七月。文中對江永學行極為推崇，認為其人身兼朱子後諸儒考核、水經地志、古音、步算諸學之大成。由此亦可窺見東原早年為學之取徑，即以「理精義明」推尊朱子，而醉心於「博物考古」之學，而其學實啟自江永，故文中云「所讀諸經，往來問難，承口講指畫，

4 楊應芹論東原《水經注》一案，據孔繼涵（1739-1783）家抄本東原《水地記》序文（作於1777）：「《水地記》乃戴東原先生二十餘年前流傳之稿底也」，推測東原治《水地記》初稿作於乾隆十九年（1754）入都前後（楊應芹：〈戴震與《水經注》〉，頁30）。據〈壽序〉「震少覽近儒之書，所心折者數人：……胡朏明、顧景范、閻百詩之于水經地志」云云，東原治《水經注》可能更在乾隆十五年前。附識於此。

然後確然見經學之本末」。⁵而文中尊稱「吾師江慎齋先生」，自稱「門人戴震」，可見二人非尋常問學關係，東原實正式著籍江永門下，稱弟子，此實無可疑者。然發現此佚文之漆永祥先生認為，由文中東原對江永之推崇而觀，清末以來學人批評東原不敬江永之說當不攻自破。其說是否可信？頗值得商榷。為澄清此一問題，以下就學者探討東原背師一案之歷程略加敘述，並根據新發現之佚文，對諸說做一檢討。

據近人胡適（1891-1962）所考，批評東原晚年不敬其師，其事起於晚清。嘉、道間學者張穆（1805-1849）在〈方牧夫先生壽序〉中云：

徽州山盤水交，實產魁儒。本朝婺源江氏，始以樸學為後進倡。一時從游，卓然深造，有稱於世者三人：曰東原戴氏，曰紫齋金氏，其一則晞原方氏也。紫齋撰述未竟而歿；東原抗心自大，晚頗諱言其師。而晞原先生終已命為江氏之徒無異詞。⁶

文中所提及之方晞原（1729-1789），名矩，安徽歙縣人。⁷為東原早年求學徽州時之學侶，東原《文集》中有〈與方希原書〉。方牧夫為方矩仲子，石舟於壽序文字中公然指斥其父執，當為方氏所認可，則東原身後，徽歙間或即有其晚年不敬江永之傳言。⁸然石舟所言較為謹飭，「諱言其師」或僅指東原諱言其學之所從

5 東原早年學術經歷，參看錢穆（1894-1990）：《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第16冊，頁387-396。

6 [清]張穆：《月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咸豐八年祁寯藻刻本，第1532冊），卷2，頁17，總頁264。按〈壽序〉中云：「端蒙大荒落之夏六月，為先生七十誕辰」，則應作於道光乙巳年（1845）。

7 參看[清]姚鼐（1731-1815）撰，劉季高標校：〈方晞原傳〉，《惜抱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44-145；[清]吳定撰：〈方晞原權厝誌〉，收入[清]李桓（1827-1891）編：《國朝耆獻類徵》（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清代傳記叢刊》本，第184冊），卷439，頁17-19a。

8 石舟於〈壽序〉中稱頌方氏家學、師法皆冠絕徽州，故批評「東原晚年抗心自大，晚頗諱言其師。」吳定〈權厝誌〉引方矩語云：「孔門而後，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道所以不終為鬼

出。魏源（1794-1857）於所撰〈書趙校《水經注》後〉一文中，則明言東原背師：

戴為婺源江永門人，凡六書三禮九數之學，無一不受諸江氏，有同門方晞（按，應缺一「原」字）所作〈羣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既盛，凡己書中稱引師說，但稱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先生，其背師盜名，合逢蒙、齊豹為一人。則攘他氏之書，猶其罪之小者也！平日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念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江氏亦不願有此弟子也。⁹

文中亦提及方晞原其人，然查閱今傳江永《群經補義》一書，如《四庫全書》、《皇清經解》、《經學叢書》諸本，皆未見文中所提方氏序文，魏氏或另有所見。王國維（1877-1857）則於〈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一文云：

東原學問才力，固自橫絕一世，然自視過高，驚名亦甚。……其著他書，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學術出於江慎修，故其古韻之學根於等韻，象數之學根於西法，與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韻西法，

魅者，程朱之力也。吾儕惇行實踐，師尊之不暇，而敢妄有瑕疵乎？」（同前註，頁 17b），與東原晚年論學意見不同，方牧夫若守家學不失，則對東原有此微言，當不足為怪。

9 原載周壽昌（1814-1884）：《思益堂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十四年刻本，第 1161 冊），卷 5，頁 6a，總頁 421。北京中華書局本《魏源集》亦收此文，但與此處所引略有不同。梁啟超（1873-1929）於所撰〈戴東原先生傳〉批評魏氏之說：「先生所以推崇慎修者，具見於所撰〈江慎修先生事略〉，其不肯慎修不俟辯。至其曾否受業慎修稱弟子，則難確考。」（原刊《晨報副刊》1923年1月19日，後收入《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第 7 冊，卷 40，頁 40-52。引文見頁 42）。按，任公未究東原對江永態度轉變事在晚年，故以東原中年所撰之〈江慎修先生事略狀〉（1762）為證。然任公於《戴東原哲學》中又云：「江慎修是他及門問業的先生，對於名物度數測算訓詁等學問都極深造。」（原刊《晨報副刊》1924年1月24、25日，後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7 冊，卷 40，頁 52-78。引文見頁 60），則已認為東原受業江永為弟子。

與江氏異。其於江氏亦未嘗篤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¹⁰

魏默深、王靜安指斥東原「背師」、於江永「未嘗篤在三之誼」，對其人品大加撻伐，較石舟所言遠為嚴厲。¹¹

由於張、魏、王諸人同時撰寫專文批評東原於四庫館校勘《水經注》時襲用趙一清著作而未言，有違學術道德之處，且其撰文批評東原晚年背師，亦與此事相關。故胡適在欲平反東原《水經注》勦襲案時，亦撰寫〈戴震對江永的始終敬禮〉一文，反駁前引三人之說。胡適遍考東原著述中提及江永之文，東原或稱「江先生」，或稱「江慎修先生」，對江永處處敬禮，毫無不敬之心。僅在《聲韻考》卷三，及為段玉裁（1735-1815）《六書音均表》所作序文二處，以「吾郡老儒江慎修永」稱之，胡適解釋說：

東原二十歲始從江慎修問學。我們看他從二十四歲到五十四歲，從少年到他臨死，提到慎修，都稱「江先生」。……只兩處敘述古音的歷史，說鄭庠、顧炎武、江永三個人的古韻分部，因為作歷史的記載，特別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的稱呼。……我請一切讀書的人細讀這兩段歷史敘述，請問這一句「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有一絲一毫不恭敬的意思嗎？於亭林則直稱「崑山顧炎武」，於慎修則特別尊稱為「吾郡老儒江慎修永」，這不是特別表示敬意嗎？「吾郡老儒」豈不等於說「吾郡的一位老先生」嗎？¹²

10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上冊，卷12，〈史林〉四，頁580。此跋文作於1924年2月。

11梁任公認為：「子貢、子思，皆字稱仲尼，未有疑其慢者。甚矣！魏氏之責人無已也。」（《戴東原先生傳》，頁42）。據《論語》所載，孔子弟子皆稱其為「夫子」，字稱「仲尼」者，多見於《禮記》，為七十子後學所記，不應相提並論。

12原刊於《經世日報·讀書週刊》第三期，1946年8月28日。後收入《胡適手稿》（臺北：胡適紀念館，1966年），第一集，上冊，卷1，頁29-30。按東原從學江永時間，胡適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繫於乾隆七年（1742），東原二十歲時。學者間對此問題亦頗有爭議，詳下文。

對於東原是否背師一問題，胡適與前引諸人論斷所據之材料相同，亦肯定東原曾師事江永，所得結論卻全然相反。然此說之說服力實甚薄弱，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言，胡適為東原辨誣，謂「吾郡老儒江慎修永」猶如「吾郡的一位老先生」，譯文言為白話，實已失去「老儒」所涵之語氣，恐不免曲護東原之嫌，因「老儒」雖不必然有貶義，但殊乏崇敬之意味。¹³否則，張、魏、王三人皆為學問大家，豈能不辨「老儒」之語義而厚誣東原？

其次，《聲韻考》卷三論古韻分部一文，實本於東原早年讀書札記《經考》卷三「古音叶韻」條，東原在《經考》中尚稱江永為「江慎齋先生」，在《聲韻考》卷三則改為「吾郡老儒江慎修永」。¹⁴《經考》成書年代已不可確考，但不晚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¹⁵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聲韻考》成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然段氏《刻《聲韻考》序》又記此書成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¹⁶今大陸上海市圖書館尚藏有東原《聲韻考》手稿本，封面副頁有其親筆題記云：

戊子年（1768）擬用小板付梓，後因論古韻未詳備，遂止。其〈古韻〉一條，壬辰（1772）始改定。¹⁷

13 見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論戴震與章學誠》，增訂本（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223。其後學者肯定東原、江永間存在師弟關係，又解釋「吾郡老儒江慎修永」一語並無不敬之意，皆同一取徑。文多不具引。

14 余先生最先注意及此點，並以此稱謂上之改動，探討江永在東原心中地位變動之原因（同前註，頁223-224）。然因余先生認為東原雖曾問學江永，但並未真正師事其人，二者誼在師友之間，故與下文所論不同。

15 參看鮑國順師：《戴震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一書所引近人梁任公、羅更、余英時先生諸人之說（頁84-85）。

16 參看鮑師前引書，頁86-87。此書共收文十六篇，非成於一時，乾隆四十一年（1776）段玉裁始刻於四川富順縣署。

17 [清]戴震撰，張岱年（1909-2004）主編：《戴震全書》（三）（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頁279。

則《聲韻考》成書時間應以乾隆三十一年說為是，最晚在乾隆三十三年初稿已成，只是東原對稿本續有改定，〈古韻〉一條至乾隆三十七年始定稿。而〈六書音均表序〉一文撰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上旬，則東原於著作中稱江永為「吾郡老儒」，其事可確定在晚年。¹⁸

故學者欲為東原洗刷背師罪名者，需另啟途轍。許承堯（1874-1964）考證東原早年與江永過從之經歷，認為二人並不存在師弟關係，在為《安徽叢書》中《戴東原先生全集》所作之序文中云：

先生之學，深造自得，不由師授。……考何達善守微在乾隆己巳（1749），先生年二十七。明年庚午（1750），方蔡如應聘講紫陽，定《新安三子課藝》。三子者，先生與鄭牧、汪梧鳳也。又二年壬申（1752）夏，程讓堂姊婿汪松岑言於其從祖之弟在湘，在湘因延先生至其家，教其子。在湘，梧鳳字，歛之西溪人，家有園不疏，園多藏書。其《松溪文集》〈送劉大櫨序〉云：「余生二十五年，從游淳安方朴山先生。後三年，從游星源江慎齋先生。」梧鳳生雍正丙午（1726），少先生三歲。其從方蔡如年二十五，正在庚午。而後三年從江慎修，則在癸酉（1753）。汪容甫（中，1745-1794）為梧鳳〈墓志〉云：「江、戴二人，孤介少合，君獨禮而致諸其家。」是江亦館汪氏。先生與江，蹤跡之密，殆無逾於此時。又二年乙亥（1755），先生入都。（原注：王昶撰先生〈墓志銘〉作甲戌之春。此從段玉裁《年譜》。）後七年壬午（1762），江卒於家。先生撰〈事略狀〉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蓋江氏之學得先生而後表章，而先生與江自庚午相見，至乙亥不過五年，誼在師友之間，原未嘗著籍稱弟子。然先生書中，於江多稱脊齋先生，且先生本亦字慎修，後遂不用。其尊之者至矣。¹⁹

18余先生取段玉裁《年譜》說，以《聲韻考》成書於乾隆三十一年，故以東原稱江永為「吾郡老儒」事在中晚年。前引文，頁223。

19許承堯：〈戴東原先生全集序〉，《戴東原先生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叢書集成》影印《安徽叢書》本，第14函），卷首，序頁2b-3。此序文撰於1937年1月。按，東原在甲戌年入都，許氏誤從段《譜》。

許氏對東原問學江永時間之考證，或有商榷之餘地，下文將予討論。然其認為東原與江永誼在師友之間，未嘗著籍為弟子，則頗為學者信從。²⁰若接受此說，則不論「吾郡老儒江慎修永」一語作何解釋，皆不存在東原背師與否之問題。余英時先生並進一步查考東原同時及稍後學者所撰之傳記文字，如洪榜（1745-1779）〈戴先生行狀〉、錢大昕（1728-1804）〈戴先生震傳〉、余廷燦（1735-1798）〈戴東原先生事略〉等文，²¹皆未明言東原為江永弟子，以為許說佐證。²²余先生未見新發現東原佚文，不足為怪，然實情是否如此，則尚可討論。茲就後續學者所考與個人聞見所及，將乾嘉時人有關東原與江永學術師承關係之文字記載，依寫作時間先後，略加疏證如下。

汪梧鳳（1725-1771）〈送劉海峯（大樾，1698-1779）先生北歸桐城序〉：

吾友志相合、業相同、擇師而事無不相同者，休邑鄭用牧、戴東原，吾歙汪稚川、程易田（1725-1814）、方晞原、金葉中（榜，1735-1801）、吳蕙川數人而已。而東原、葉中自鄉舉射藝京師，于今未歸者七年。……憶余生二十五年，從遊淳安方朴山先生，後三年從遊星源江慎齋先生。……今年辛卯，易田又以鄉舉走都門獻賦天子，而先生亦以年髦思返桐城。²³

此序文乃為劉海峯北歸桐城而作，事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尚在東原生前。與方矩相同，汪氏亦為東原早年學侶，乾隆十七年曾館東原於家，教授其子，前引許承堯文已論及。故文中「吾友志相合、業相同、擇師而事無不相同」一語絕無可疑之處，則東原早年曾師事江永，此為證據之一。

鄭虎文（1714-1884）〈汪明經松溪行狀〉云：

20如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頁 213-217；楊應芹：

〈戴震與江永〉，《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4 期，頁 35-40，轉頁 94。

21戴震撰，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二刷），〈附錄〉，頁 251-275。

22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頁 215-217。

23收入〔清〕汪梧鳳：《松溪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刻本，第十輯，第 28 冊），頁 6-7，總頁 148。

君制義師淳安方氏蔡如，古文師劉氏大樞，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為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²⁴

鄭氏又撰有〈為徽州守汪夢齡作婺源江先生從祀紫陽書院朱子祠碑記〉一文，其中亦云：

當未沒時，士之從先生受學以經術名者，徽為盛，戴震其最著者也。洎先生歿，貧不能護其子，鄉之士益信經術為迂闊不足用。雖戴震輩斷斷然持師說不少變，卒亦無有能信從之者。²⁵

考此二文寫作時間，前者撰於乾隆三十六年，汪梧鳳卒年；而江永入祀徽州紫陽書院，其議起於時任安徽學政之朱筠（1729-1781），事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²⁶故後文之作年亦可定。鄭虎文與東原、朱筠、汪梧鳳三人皆相識，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後又曾陸續講學於徽州紫陽書院者十年。²⁷故所言不僅本之於親身見聞，且二文皆撰於東原生前，可為東原早年曾師事江永之證據者二。

乾隆四十年（1775），江永弟子汪世重及其孫江錦波撰《江慎修先生年譜》，在「乾隆十八年癸酉」條云：

24收入〔清〕鄭虎文：《吞松閣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刻本，第十輯，第14冊），卷35，頁6b，總頁346。

25同前註，卷29，頁15b，總頁284。

26同前註。姚名達（1904-1942）編：《朱筠年譜》（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民國叢書》影印商務印書館版，第三編第76冊），未載此事，可據補。

27章學誠（1738-1801）〈答邵二雲書〉云：「丙戌（1766）之春，僕因鄭誠齋太史之言，往見戴氏休寧館舍。」〔清〕章學誠撰，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553可證；而鄭、汪二人過從經歷可參考〈汪明經松溪行狀〉，同註21。鄭虎文，字炳也，號誠齋，其生平可參看汪喜孫（1786-1848）：〈鄭先生家傳〉，收入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中冊），《尚友記》，卷1，頁717-724。

館歛邑西溪（按，即汪梧鳳「不疏園」）。歛門人方矩、金榜、汪梧鳳、吳紹澤從學。休寧鄭牧、戴震、歛汪肇龍、程瑤田前已拜門下問業。是年殷勤問難，必候口講指畫，數日而後去。²⁸

此《年譜》撰成於東原生前，據王昶（1724-1806）〈江慎修先生墓志銘〉所言：

余友休寧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慎修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於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志先生者，卒不果。又十餘年，余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為狀及汪世重等《年譜》而屬余銘之。……先生弟子著藉甚眾，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²⁹

可知王昶撰述江永〈墓志銘〉，其事出於東原之請託，且東原亦見及汪世重等所撰《年譜》，則東原曾師事江永，且為其自身所承認，此為確證之三。王昶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自蜀還朝，故所撰江永〈墓志銘〉當成於乾隆四十一、四十二年（1777）間，亦為東原所及見。³⁰此可為東原曾師事江永之確證者四。

盧文弨（1717-1795）〈江慎修河洛精蘊序〉：

向吾友戴東原在京師，嘗為余道其師江慎修先生之學，而歎其深博無涯涘也。³¹

28〔清〕江錦波，汪世重編：《江慎修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民國十二年鉛印本，第92冊），頁6。

29收入〔清〕王昶：《春融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第1438冊），卷55，頁3b-5a，總頁216-217。按，陳勝長與董忠司二位學者已注意及此條材料。參看陳勝長：〈論戴震之師承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9期（1988年），頁363-377；董忠司：《江永聲韻學評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頁5-6。

30參看陳勝長：〈論戴震之師承問題〉，同前註，頁366。

31收入〔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四部叢刊》影印閩縣

余英時先生已注意及此序文，然因序文撰於乾隆五十年（1785），故余先生認為盧文弨以東原為江永弟子之說，在東原卒後八年，非第一手證據。³²其實抱經言東原向其道及江永之學，事在其居北都之時。考抱經於乾隆十七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二年（1757）陞翰林院侍讀學士；³³而東原於乾隆十九年（1754）入都，二十二年冬出都至揚州。³⁴故東原向抱經道及江永之學，即在此數年之間。可知〈河洛精蘊序〉之撰作時間雖在東原身後，但所記之事尚遠在其前，其說可信。此為東原曾師事江永之確證者五。³⁵

以上所論列之部份材料，亦為討論東原與江永關係之學者所得見，然或出於鄉梓之誼，有曲護東原之處，如胡適與許承堯；或因其事有關學人品格，較為慎重其事，對相關材料之解釋趨於保守，如余英時先生。然新發現之東原佚文，實為東原與江永存在師弟關係最直接之文字證據，從而亦可證明前引乾嘉學人有關

李氏觀樞齋藏嘉慶本，第 88 冊），卷 6，頁 5-6，總頁 50。

32 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頁 217，註 61。

33 參〔清〕江藩（1761-1831）著，鍾哲點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二刷），卷六〈盧文弨〉，頁 91。江藩云：「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同前）；東原〈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云：「今春（乾隆二十二年）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予，又得改正數字。」（《戴震文集》，頁 17），亦可證。

34 參看鮑國順師：《戴震研究》，頁 27-34。

35 此外尚有關於東原、江永為師弟之記載，如凌廷堪（1757-1809）〈戴東原先生事略狀〉：「時婺源江君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先生偕其縣人鄭牧、歙人汪肇濤、方矩、汪梧鳳、金榜師事之，而先生獨能得其全。」（〔清〕凌廷堪撰，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313）；吳定〈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誌銘〉：「自江慎修開經學之宗，先生暨東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經學遂冠於時。桐城姚姬傳嘗曰：『國朝經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識者以為知言。」（〔清〕錢儀吉〔1783-1850〕等編：《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上冊，卷 50，頁 265）；焦循（1763-1820）〈國史儒林文苑傳議〉：「江、戴師弟，談天異轍。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清〕焦循撰：《雕菰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卷 12，頁 183）。因諸文撰成時間較後，恐學者質疑其證據力，姑附識於此。

江永與東原師弟關係之記載皆是可信的。故東原曾師事江永，既為其本人所承認，其平日口談亦不諱言曾從學江永之事實，江、戴師弟關係又為當時人所共知，則此事實無可疑者。

然而發現此佚文之漆永祥先生認為，由文中東原對江永之推崇而觀，清末以來學人批評東原不敬江永之說當不攻自破，則不可信。因〈壽序〉撰於乾隆十五年，而歷來批評東原對江永「未嘗篤在三之誼」，背師一事，事在晚年。前文已略加闡述。故東原〈壽序〉一文乃坐實其晚年不敬江永之說，而非相反。漆氏未及分辨東原早年與晚年對江永態度之不同，因而未能察覺此篇佚文對解決東原晚年背師一事之關鍵所在，實甚為可惜。

三

確認江永與東原間之師弟關係，則東原何時從學江永？亦可根據新發現之佚文加以討論。歷來對此問題主要有三種看法：一在乾隆七年（1742），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主之；一在乾隆十五年（1750），魏建功（1901-1980）、許承堯、錢穆先生諸人主之；³⁶一在乾隆十八年（1753），大陸學者楊應芹《東原年譜訂補》主之。³⁷因〈壽序〉一文有明確之撰年，故第三說不可信。³⁸而段玉裁從學

36魏建功說見其《戴東原年譜》乾隆十五年條，原刊《國學季刊》第二卷一號（1925年），亦收入《戴震全書》（七），頁100-129；錢先生說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94；許承堯說見前引文。

37收入戴震撰，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六）（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653-655；亦見楊應芹：〈戴震與江永〉，頁35-36。

38按楊氏主乾隆十八年說，一因其以汪梧鳳〈送劉海峯先生北歸桐城序〉所云乾隆十八年從學江永事，發生於紫陽書院；其次，因方燾如為毛奇齡（1623-1716）弟子，毛西河反程、朱之學，方氏亦同。故楊氏認為方燾如與江永二人學術觀點大相徑庭，不可能於乾隆十五年時同講學於紫陽書院。然考《江慎修先生年譜》乾隆十八年條，汪梧鳳從學江永，事在江氏館於其家時，而非紫陽書院，且《年譜》亦云東原在此年前已拜江永門下問業；其次，據《清史列傳》方氏傳記所論：「燾如從奇齡讀書，而說經一遵古注，義理必折衷朱子，亦不效毛氏之排擯也。」（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8冊，卷71，頁5823），可知

東原較晚，《年譜》關於東原早年經歷之記載，主要由洪榜〈戴先生行狀〉得來，然因〈行狀〉中並未明確指出東原從學江永時間，故學者對乾隆七年說亦有所質疑。

推論東原從學江永於乾隆十五年之依據，乃因是年方燾如為徽州知府何達善（1704-1769）所請，主講於紫陽書院。³⁹而洪榜〈行狀〉於敘及此事後，又云：

時郡守何公，常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於書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焉。⁴⁰

故論者將二事加以聯繫，定其時於同一年。然考《江慎修先生年譜》，江永於此年乃館於婺源汪陞家，未有講學紫陽書院之記載。⁴¹故洪榜〈行狀〉之說可疑。且觀東原於〈壽序〉所云：

吾師江慎齋先生，生朱子之鄉，上溯漢、唐、宋以來之絕學，以六經明晦為己任。震少知向慕；既數年，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所讀諸經，往來問難，承口講指畫，然後確然見經學之本末。既而先生就館本邑，未能從學，深憾恨焉。

因〈壽序〉撰於乾隆十五年，可知東原從學江永實在此年之前。然否定東原於乾隆十五年從學江永，段玉裁《年譜》乾隆七年說是否即可取信？考《江慎修先生年譜》，江永乾隆五年（1740）館於程恂家，同年八月與程氏一同入都，六年（1741）八月始自都歸里。乾隆七年九月講學於紫陽書院，十月入江西學政金德瑛府閱卷，八年（1743）五月自江西歸里。乾隆九年（1744）館於休寧五城，十年至十

方氏對朱子之態度，與其師毛西河不同，楊氏之推測亦無據。故不待新發現之佚文，即可知楊說不確。

39參註 35。余英時先生亦主乾隆十五年說，並對此說加以補證。參看前引文，頁 214-215。

40戴震撰，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附錄〉，頁 254。

41江錦波，汪世重編：《江慎修先生年譜》，頁 6。

二年（1747）間館於休寧程恂家。乾隆十三年（1748）至十五年間則館於婺源。⁴²而東原於乾隆五年隨其父至南豐，客學童於邵武，至乾隆七年方自邵武歸。⁴³洪榜〈行狀〉於東原乾隆七年見程恂後，又云：

同族戴長源先生瀚以此名於時，家於江寧。文林公因往江寧，命先生步隨以從，就謁長源先生。……因館于其家……既月餘，一日，取案上〈檀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終一節，未嘗不稱善。因命題令為時義一通，先生援筆立成，大加嗟賞。翌日，謂文林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今歸矣，所業甚精，可以無示人。」⁴⁴

觀文中所敘，東原至江寧謁戴瀚，應在乾隆七年，然停留時間應甚為短暫，僅一、二月間。而江永於乾隆十三年後館於婺源汪陞家中，東原〈壽序〉中云：「先生就館本邑，未能從學」，可知東原從學江永當在乾隆十三年前。其次，東原早年著作《考工記圖》成書於乾隆十一年（1746），為「有圖無注」本；乾隆二十年復為補注，至二十一年（1756）書成付刻。陳勝長以《考工記圖》卷下「為規識景」圖題下注語：「此圖得之江先生」，非付刻前所加，可為東原乾隆十一年已從學江永之證明。⁴⁵其說可從。故東原從學江永時間，應在乾隆七年至十一年間。

東原〈壽序〉又云：「震少知向慕；既數年，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江永於乾隆七年九月曾應郡守敦請，主講於紫陽書院，而此年東原亦自江寧歸。故東原可能於乾隆七年九月在紫陽書院中首次進謁江永，然因是年十月江永即離徽至江西，二人聚首時間不長。乾隆九年至十一年，江永館於休寧期間，東原「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⁴⁶正式從學於江永。段玉裁《年譜》

42江錦波，汪世重編：《江慎修先生年譜》，頁4-6。

43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戴震文集》，〈附錄〉，頁217。

44戴震撰，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附錄〉，頁254。

45陳勝長：〈論戴震之師承問題〉，頁367-368。

46按此處所云「斗山」，不能確定為地名或書院名。若為書院名，則應指歙縣「斗山書院」，在縣東城斗山之巔，原為精舍，明萬曆年間改為書院，湛若水（1466-1560）曾講學於此（參看〔清〕張佩芳修，劉大樾纂：《歙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據清乾

載乾隆七年東原取平日所學就正於江永，可能為東原於紫陽書院始謁江永之時，此時東原尚未拜入江永門下。《年譜》載東原於乾隆九年成《籌算》一卷，十年成《六書論》三卷，十一年成《考工記圖》，為東原早年著作開始大量出現之始。故可能在乾隆九年，東原二十二歲時，正式從學江永，受江永細心指教，「所讀諸經，往來問難，承口講指畫，然後確然見經學之本末」，故所學能有大進。⁴⁷

四

然而確認東原與江永存在師弟關係，東原早年即師從江永，卻引伸出另一問題。據現存東原著作與相關傳記資料，及其與段玉裁過從之經歷查考，可知東原對傳統師生之關係，實抱持甚為嚴格之觀念，如漢人之例，所謂「親受業者為弟子」，而非普通問學之謂。⁴⁸若持東原之觀念，檢驗其對江永之態度，則不免使人迷惑。⁴⁹因江永與東原師生之關係，既為其本人承認，亦為當時人所熟知，東

隆三十六年刊本，第 232 號，第 1 冊），卷二之三，〈營建志·學校〉，總頁 288-289）。然東原〈壽序〉言「吾邑」，則其地應在休寧。俟考。

47 錢穆先生認為：「東原始從江慎修遊，當在其庚午（1750）至紫陽書院時，此書云：『家貧不獲親師』，則在庚午未識慎修時語也。惟段《譜》謂壬戌（1742）東原自邵武歸，即就正於慎修，則背師之誚，又不俟於他日『婺源老儒』之稱矣。未知段《譜》果何據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94）文中引東原語，出自〈與是仲明論學書〉，錢先生考證此書撰於乾隆己巳（1749）、庚午年間（同前，頁 393）。余先生認為東原於〈顧氏音論跋〉（癸未，1763）云：「見答江丈論小學書」，可見係以後輩身份問學於慎修（前引文，頁 217，註 61）。二說對東原是否師從江永，看法不同，但皆對東原乾隆早年從學江永與晚年方不敬其師一說有所衝擊。按，經韻樓《文集》本〈顧氏音論跋〉「見答江丈論小學書」語，在微波榭本作「見答江先生論小學書」，然經韻樓本刊刻在後，未知何人所改動。而東原於〈與是仲明論學書〉云「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或指少時塾師而言，未必指江永。

48 參看余英時先生前引文；鮑國順師：〈戴震與段玉裁的師弟情誼與學術關係〉，《清代學術思想論集》（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2 年），頁 83-105。

49 梁任公云：「先生〈與姚姬傳書〉謂：『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段茂堂上書稱弟子，先生復札云：『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其

原對師弟子關係又如是看重，何以晚年對其本師江永有此缺乏崇敬意味之語？

余英時先生解釋東原晚年稱江永為「吾郡老儒」，有別於早年之尊禮，可能與東原對「道」之新體認有關。因為東原晚年對義理之學深造有得，遂降考據為第二義之學，復別有自得之義理以替代宋儒之說。就東原晚年之見解言之，則江永之學已不足以言聞道，故在東原心中之地位，有此先後之不同。⁵⁰余先生取許承堯說，認為東原與江永誼在師友間，此因余先生未見新發現之東原佚文，不足為奇。然其對東原心理轉變之解釋，則頗為可信。實齋在〈答邵二雲（晉涵，1743-1796）書〉一文中云：

惟僕知戴最深，故勘戴隱情亦最微中，其學問心術，實有瑕瑜不容掩者。……夫行不踐言，學者亦時有，要其所言本于所見，卓然不可誣也。獨至戴氏，而筆著之書與口騰之說，或如龍蛇，或如水火，不類出于一人，將使後人何所取準也！……戴氏筆之於書，惟闢宋儒踐履之言謬爾，其他說理之文，則多精深謹嚴，發前人所未發，何可誣也！……然其身既死，書存而口滅，君子存人之美，取其書而略其口說可也。⁵¹

實齋因東原筆舌分施而致疑於其人心術未醇，在當時已引起邵二雲之質疑，故有上引書信之解說。然或如實齋所論，東原學問、心術，實有瑕瑜不容掩者，當分別觀之。治學後出轉精，弟子亦不必不如師，實為學術發展正常之現象。雖然新發現之材料，對理解東原與江永之關係有所助益，但東原晚年對江永態度轉變之心理因素，因資料有限，不敢過為推論。不論晚年背師與否，實為東原之私德問題，對其人學術思想之研究而言，誠為枝微末節。以上謹就新發現之材料，對此公案做一客觀之論述，非好為苛責古人也。

平日持論如是，則其所以事慎修者，固當率此義以行，況其學原非盡出慎修耶！」（〈戴東原先生傳〉，頁42）。按，東原謙辭師名，以友朋間亦可相師，故僅欲與茂堂等為友。若正式成為師弟關係，論學之際雖可相互取法，然師可於論著中稱弟子名字，或稱友、同志等，未聞弟子反以此稱師者。任公此處之解說不可信。

50 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頁224-229。

51 章學誠撰，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頁553-554。

The Newly Discovered Dai Zhen's Scattered Article and the Re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m and Jiang Yong

Lin Sheng-tsai*

{ Abstract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ll-known Qing scholar Dai Zhe (戴震) (1724-1777) and Jiang Yong (江永) (1681-1762) aroused much discussion since the former's death to the present day.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e first is that Jiang and Dai held a master and pupil relationship which Dai betrayed and disrespected Jiang in his late years, the second is that Dai maintained the relationship and respected Jiang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the last one is that their relationship was something between master-puple and friends. Now the debate may come to an end owing to the newly discovered scattered article which Dai wrote in congratulations of Jiang's 70 years old birthday. It definitely shows that Dai held a formal relationship of master and pupil with Jiang at that time, which he betrayed and disrespected Jiang in his late years.

Keywords: Dai Zhen, Jiang Yong, the scattered article, tributes on 70th Birthday, the relationship of master and pupil

*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Kaohsiung Hospitality College.

